

東亞視角下的蔣介石研究

[韓國]裴京漢

一

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隨著兩國經濟、政治、文化交流的持續擴大，韓國人對於當代中國的關注也與日俱增。但與此同時，韓國學術界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尤其是蔣介石研究之類的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乃至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卻在逐漸萎縮。究其緣由，此現象雖然在所有國家都很普遍，但更主要是在於不僅整個社會對歷史學等人文學領域的關注日益減少，即使在歷史學界內部，相對於經濟史、政治史等傳統研究領域，更多的研究者將目光轉向了文化史、生活史等新領域。

我對蔣介石研究發生興趣始於碩士課程入學的1978年。當時韓國社會正處於朴正熙軍事政權末期，國民對政治的參與受到極大程度的限制，獨裁政權的統治正處於高峰期。當時我與大部分大學生一樣，對軍事政權持批判及反對的立場，所以對蔣介石發生的興趣其實乃是對“朴正熙般的獨裁的軍人政治家蔣介石”而發生的。說起來，我對蔣介石之關注與其說是學術性的，倒不如說是源自現實性、政治性的關注，也可以說我是基於對軍事政權在亞洲的起源及其統治結構的關注才進而開始研究蔣介石政權的成立過程的。當然，我的這些關注也得到恩師閔斗基先生的嚴格的學術性訓練，並且很多部分得到了先生的修正。比如說從對所謂的“革命史觀”乃至“國共”或“左右”理念的對立等既存視角進行批判的角度出發，研究、復原蔣介石政權的歷史實態，由此而得到的研究結果，與當初只是對蔣介石感興趣的階段大不相同。雖然如此，我的第一篇研究成果——1995年出版的《蔣介石研究——國民革命時期軍事、政治的抬頭過程》，也是基於考察亞洲乃至中國軍事政權的成立過程這一當初的問題意識。

《蔣介石研究》出版以後，我所關注的領域雖然擴展到民國時期及孫文、汪精衛等其他政治領袖，但對蔣介石的關注卻始終未變。尤其是2005年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了《蔣介石日記》，這再次喚起了我對蔣介石研究的興趣。2006年夏至2007年夏間，我利用一年的學術休假到斯坦福大學全面研究《蔣介石日記》，2007年以後開始寫了幾篇有關蔣介石的論文。

二

1990年代中期以來，在中國史研究領域，韓國學術界研究視角的最大變化當屬所謂“東亞視角”的提出與應用。“東亞視角”的核心內容是擺脫把中國史、韓國史、日本史看作是單獨的

國家史，即一國之史的狹隘視角，以整個東亞的、相對寬闊的視角來審視歷史。眾所周知，亞洲各國的近代史多以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為始，並且各國的近代史都具有一個共同的潮流，即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以及與此相應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由此可見亞洲的近現代史，尤其是以中國、韓國、日本、越南為中心的東亞近現代史，與其說是各個國家的一國之史，倒不如將其看做是一個歷史的共同體更為妥當。這也正是我提出應將東亞看做一個統一範疇的原因。

但是對於東亞視角的內容、優點以及範圍等方面，至今還存在著諸多爭議。中韓之間或者中日、韓日之間常常出現歷史糾紛，其中顯露出民族主義性的歷史解釋常具有狹隘性及主觀性，一不小心便很有可能演化成與鄰國的糾紛。韓國的東亞視角發端於市民運動，它希望通過更加客觀的、廣泛的相互理解，以建立和平、互惠的東亞國際關係。這一點雖然可以展示東亞視角的現實性效用，但另一方面，要作為以客觀性為基礎的學術性視角得以認證，尚有諸多障礙。

在“東亞視角”被正式提出前，我便使用“從周邊看中國”這一視角來研究近現代中國政治史，所以“東亞視角”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當然，雖然現在圍繞著“周邊”一詞所包含的地理範圍以及周邊的構造、特點等尚有諸多異議，但是周邊視角本身對將中國視為中心，將周邊國家視為區別性的存在的批判的觀點出發，“從周邊看中國”的視角與“東亞視角”，可以說都是以實現平等互惠的東亞國際秩序為目標。也就是說，“東亞視角”與我之前所說的“周邊視角”有相當部分的重合之處。東亞視角具體應用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一個很好的實例是，2011年在首爾召開的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國際學術大會打出了“東亞史上的辛亥革命”這一主題。當時被委以組織者之任的我，無論是在具體學術大會主題還是在與論文發表者的交涉過程中，最為著重強調的是應探究東亞史上的辛亥革命的意義，而非中國一國之辛亥革命的意義。該主題主要聚焦在以下兩點：首先是辛亥革命在亞洲乃至東亞歷史上對共和制（廣泛來講即民主主義）的接受及擴散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其次是民族主義革命——辛亥革命的結果是以清朝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的消失，以及因此而衍生的中國周邊弱小民族意欲擺脫中國統治而進行的分離及爭取獨立的民族主義（廣泛來講即東亞民族間的互惠與平等）運動的擴散及展開。通過這次由韓國學者以及中國大陸、台灣、日本、越南、蒙古學者共同參與的學術大會，雖然不能說將“東亞史上的辛亥革命”的意義盡數“充分”究明，但可以明確的一點是，這樣的研究視角必將對加深理解20世紀初亞洲作為一個歷史共同體而存在大有助益。此次大會所發表的論文以《東亞史上的辛亥革命》為名，已於2013年6月由首爾Hanul出版社出版發行，期待國際學界提出多樣的批評與意見。

三

那麼，東亞視角下的蔣介石研究提出怎樣的研究內容及研究方向呢？以及較之以往的蔣介石研究有著怎樣的優點？接下來將使用三個實例來討論東亞視角下的蔣介石研究。

第一，作為蔣介石軍事政治抬頭的實際性基礎的黃埔軍校的創立，是以聯蘇容共為要義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最主要結果之一。眾所周知，1920年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G. Voitinsky）被派遣到上海並開始了一系列摸索；之後馬林被派遣到中國；中國共產黨創立；國民黨進行改進和改組；國民黨代表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問蘇聯；蘇聯派遣軍事顧問以及財政支援等，第一次國共合作基本上是按照這個順序展開的。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初期，為推進亞洲殖民地弱小國家的共產革命，共產國際戰略性地採用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政策，即聯合陣線政策，由此中國與

韓國、越南、日本等國都緊密的連接起來。因此，為理解蔣介石政治的軍事性抬頭問題，而對其決定性的問題——黃埔軍校的創立過程及運營過程，以“黃埔軍校”為中心的國共間的對立與矛盾，蔣介石對“國共左右對立”的應對，以及中山艦事件的爆發及解決過程等問題進行研究時，不應只局限於黃埔軍校這樣一個狹小的範圍，而是有必要採取一個相對較寬闊的視角，即同時需考慮東亞範圍的共產主義運動，共產國際的東亞政策及東亞各國民族主義運動勢力對其之應對，東亞弱小民族的民族運動與黃埔軍校的關係等問題。當然，在以這樣的東亞視角對黃埔軍校進行研究時，在史料使用問題上，不僅要使用中國的，同時也需要使用蘇聯、日本、韓國、越南等國的相關史料。

第二，1937年7月“七七事變”後正式開始的中日戰爭進程，首先具有“中國的抗日戰爭”的一面，但其同時也必然與淪落為日本殖民地以及佔領地的韓國等東亞各國的獨立運動乃至抗日戰爭有著緊密的聯繫。雖然在1941年12月日本襲擊珍珠港後，戰爭擴大至太平洋地區的全面戰爭，抗日戰爭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在這一前提下則需要用全球的視角對中日戰爭進行研究，儘管其主戰場仍是在東亞地區。1942年11月開羅會議召開以後，為應對戰爭，中國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的大國地位在名義上被恢復。雖然只是名義上被恢復，但卻具有構建及協商戰後東亞國際新秩序的作用。因此在對中日戰爭時期的蔣介石進行研究時，必然需要考慮到東亞整體的歷史情況。比如說開羅會議關於對戰後韓國獨立的原則上支持的決議，蔣介石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認為蔣介石在開羅會議前後對韓國問題的理解，都是從為了繼續確保戰後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以中國為中心或是中國優越（或是中華主義的）的立場出發的，但即便如此，在理解這一時期蔣介石的國際作用時，也必須同時考慮與韓國等東亞各國問題的相關性。

第三，1949年蔣介石敗退台灣後不久，韓國戰爭爆發，之後中國大陸出兵韓國，這些都成為台灣國民黨政權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下去的決定性原因。在從大陸敗走前不久，1949年夏，蔣介石訪問韓國並與韓國親美政權首腦李承晚進行短暫會談，雙方表示為形成亞洲反共聯盟而努力；韓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軍隊又積極主張出兵韓國，這些史實都說明，在進行這一時期的蔣介石研究時，還需要對中國大陸與韓國、台灣、美國等方面的關係加以綜合性考慮。也就是說，蔣介石退出大陸與韓國戰爭的爆發及進展告訴我們，這些所謂的“東亞地區的冷戰體制”的確立過程中所顯示的一連串的事態，不僅是中國一國的問題，而是需要將其與整個東亞乃至世界史的進程銜接起來進行理解。由此可見，對後期的蔣介石進行研究，尤其是對在台灣蔣介石統治體系及穩定過程進行研究時，需要同時研究討論與韓國戰爭同時進行的整個東亞冷戰體系的形成問題。

以上三點問題都從以韓國的相關性為中心提出了東亞視角的必要性，但是這樣提出的問題通過日本、越南等東亞其他國家學者的參與，可能更具有多樣性。當然，視具體情況，很多時候東亞的範圍也需要擴展到包括美國、英國、蘇聯等國家的更寬闊的視角。但正如上述那樣，很多研究者都認為蔣介石活動的20世紀初中期的亞洲是作為一個歷史共同體而存在的，蔣介石研究應該以此為前提。在這樣的東亞視角下的蔣介石研究，與以往的以中國一國為中心的蔣介石研究相比，不僅研究結果更具有多樣性，並且還會對東亞人建設“和平與共存之亞洲”大有助益。

作者簡介：裴京漢，韓國新羅大學人文學院史學科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陳志雄〕